

北京琴讯

2000年6月 第6期总第62期 北京古琴研究会刊行

【本刊讯】 本次月集虽值炎暑，仍有二十余人到会。其中有老琴家、年轻琴友和头一次参加活动的古琴爱好者。韩钧先生留美学习工作，此次短期回国，仍挤出时间与会。田双琨先生携来他最近新制的古琴供大家演奏。

会上陈长林先生介绍了他于今年六月三日应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业余组织“中医协会”邀请作古琴讲演的情况：协会会员近200人，加之闻讯而来专程听讲演的其他听众约三百多人，坐满了280人的会场，有不少人挤在门口和两边甬道站着听。讲演从上午九时进行到十一时，会后许多学生上台提问，直到中午十二点，因学校已派定车送陈先生回家，时间关系，所以只好停止答问。青年一辈如此喜爱古琴音乐，给陈先生很大的鼓舞，他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多做宣传推广，那末古琴爱好者以至古琴演奏者、研究者的队伍，必将不断扩大。 （泉）

【又讯】 在美国研究电脑多媒体的北美琴社社长王菲小姐现正制作网上音乐电台。为弘扬古琴艺术，扩大《北京琴讯》的涵盖面，方便人们迅速阅读，已开始将每一期《北京琴讯》上因特网。

网址是 <http://WWW.Chineseculture.net/guqin/>
在此网页还可以听古琴音乐，与琴友聊天，每周一至五 7:00—11:00an 直播中国音乐，并为古琴家在网站上介绍个人出版的CD。 （霆）

连载②中国古琴流传日本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谢孝苹

（二）

唐朝的建立，古老的古琴音乐始大量流传日本。

唐朝的经济、文化上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唐代文化对亚洲各国的影响是异常显著的，尤其是对日本，其诱惑力很大。在朝野一致要求下，学习中国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在日本形成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热”。七世纪以来，遣唐使、遣唐生、学问僧纷纷前来中国留学。据不完全统计，从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至唐昭宗乾宁六年（公元894年）日本派往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共有二十二次。而其规模也越来越大。仅公元732年的一次，人数达到五百九十四人之多，派来中国的学习使团中又常有画师、音乐家随行。“因此唐代乐器，也随日本归国使众，流传东瀛，今日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国宝，有不少是唐代流传的文物。其刊入《东瀛珠光》中的，犹保存着唐代宝贵的乐器。”^{①②}这种学习中国的高度热潮，给古琴艺术流传东土，提供了良好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

这一时期，中国的古琴音乐也在飞速地发展。它从一个不太完善和不定型的阶段，逐步趋向成熟和定型；并在作曲、记谱和弹琴技巧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双足、七弦、十三徽的中国古琴形制，基本上稳定下来，一直流传到今天未变。许多文献资料都记载了唐代古琴音乐兴盛发达的情况。这里，且从一个侧面，即唐代诗人的创作中，略窥其一斑。

两晋南北朝的诗歌，虽然有个别章句咏琴，但尚未产生专门论琴或听琴的诗，更谈不到有什么深刻的内容。到了唐代，情况大变。琴成为诗人经常刻意描绘的内容，于是出现了不少专门咏琴的诗。如李白的《幽涧泉》，王维的《竹里馆》，白居易和孟郊各自的“听琴”诗。诗歌中还出现了描写某一特定的琴家弹琴的诗。如孟浩然的《听郑五¹⁷弹琴》，李白的《听蜀僧¹⁸弹琴》，韩愈和李贺各自有一首《听颖师弹琴》诗。诗歌中还出现了聆听某一琴家弹奏某一琴曲的诗，如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诗。这些描绘古琴音乐的诗歌，其刻画的内容，日益广泛和深刻。新的诗歌体裁的出现，从侧面说明古琴音乐进入了一个高级的阶段。古琴音乐在唐代的兴旺发达，在客观上形成古琴音乐大量流传日本不枯竭的源泉。

公元七世纪以来，日本对唐文化几乎采取全盘接纳的态度，音乐文化上的表现尤为突出。唐朝雅乐，在中国本土已经失传，但日本的宫廷乐队尚能演奏。相传周武王所作的大武曲，其《太平乐》，《五常乐》，以及大曲《秦王破阵乐》皆由唐时传入日本¹⁹。明治十年，日本宫内省雅乐部曾经演奏唐代古曲，招待中国使团。一九八二年六月初，我国赵紫阳总理访问日本，于六月一日会见日本裕仁天皇，天皇的丰明殿招待赵总理，身穿古装的乐队，演奏了从唐代流传下来的雅乐《老君子》和《长庆子》²⁰。许多中国乐器都是在唐代输入日本的，如阮咸、筝、琵琶、横笛、笙、筚篥、尺八、羯鼓等²¹。琴的输入日本，虽早于唐代，但大量流传却在唐王朝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

七弦古琴流传日本最早见于记载的约在东晋时期。前引《河海抄》谈到中国琴学时，曾提到允恭、天武、延喜三个年代。允恭天皇当东晋安帝义熙年间。它处于嵇康写《琴赋》以后的时期，琴已经有了徽，古琴形制，初步走向定型。天武当唐高宗时代，延喜当唐昭宗年代。公元878年（当唐僖宗乾符五年）时，日本史籍《文德实录》记文德天皇三年（公元853年，唐宣宗大中七年）记事曰：“关雄尤好鼓琴，天皇赐其秘谱。”²²关雄是见于正式记载的第一位日本古琴家。又据《三代实录》云：“贞观六年二月二日巳未从五位下行越复守高德朝臣文室麻吕卒。……文室麻吕琴之名冠于当时。”²³贞观是日本清和天皇年号，贞观六年当唐僖宗咸通五年。文室麻吕是继关雄后见于正式记载的又一位日本古琴家。又据《本朝文粹》载，宽平八年，长谷雄撰《历代宝琴铭》。宽平，宇多天皇年号。宽平八年当唐昭宗乾宁三年。关于琴铭，国人从事于此项专题研究者甚少。荷兰琴家高罗佩曾于1937年撰《琴铭之研究》一文，载于日本《书苑》一卷十号。中外琴家，为之拭目。然早在公元九世纪时，日本古琴家就从事此项研究，令人钦佩。关于七、八两个世纪，中国古琴音乐在日本流传的情况，在日本的史籍、笔记和官方文书都有不绝如缕的记载，轻易加以否定是困难的。

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过贡献的藤原贞敏（807-867）曾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到达中国，从中国乐师刘二郎学习琵琶，由于他的精湛的艺术水平，回国后被尊为日本琵琶的开山之祖。相传藤原贞敏在中国时，和刘二郎的女儿结了婚。他的夫人是一位才女，既会弹琴又会弹筝。人们认为，日本筝法和琴法，是这位夫人由中国带去的。此说是否可信，姑且弗论，就把它算作唐代古琴流传日本的一段逸闻吧！

下面再从一些实物资料，来看唐代古琴流传日本的情况。

前面提到《文德实录》曾记载天皇把秘传琴谱赐给关雄的事。可见古琴谱在唐代已经流传到了日本。据江苏江宁图书馆《善本书目》²⁴，该馆收藏《乐书要录》一册，光绪重刻《正觉楼丛书》所收，影抄日刻《佚存丛书》本。该书系唐武后时写本，原为十卷，今仅存五、六、七三卷，并为一册。书为日本奈良朝遣唐使吉备真备（约公元694-775）归国所献²⁵。吉备真备回国时还带回律管、方响等多种乐器。《乐书要录》是研究古琴律学的书，是传入日本早期琴书之一。

另一部传入日本的古琴谱是《碣石调幽兰谱》。这是一部唐人写本，其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已无从查考。但我认为这个珍贵的写本，传入日本的时间，不能晚于唐代。

《碣石调幽兰》是公元589年南朝陈祯明三年丘明所传。它是一个仅有的古琴还没有减字谱以前的唐人写本文字谱。我国考据家杨守敬在日本访求古书时，发现了这个卷子，就把它影摹下来。驻日公使黎庶昌，把它编入《古逸丛书》，刊于1884年。据林谦三说，杨氏发现的这个本子尚非原本。原本现藏京都上京区西贺茂之神光院，于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定为国宝⁽²⁴⁾。

这是一个完整的唐人写本。从其字迹观察，是德宗年间唐人笔迹。当时活字板尚未发明，写本数量不会很多。它只是在唐代某一时期流行过。后来一直未获流行。按照常规，本子只能在流行时期方才有外传。唐德宗以后到唐昭宗一百年左右，中国和日本的交往，虽非极盛时期，但仍属盛时，而这一时期又正是幽兰本子流行时期。因而，本子在德宗以后昭宗以前传去日本的可能性最大。后来日本较长时期实行锁国政策，而幽兰本子在中国国内又没有再度流行，其传去日本的可能性，当然就难以存在了。

《幽兰》写本，长期以来，湮没无闻。“日本音乐史家林谦三氏在《东洋音乐研究》二卷四号，指证此谱原本最早在明治四年（1871年）为西京神光院僧和田智满所有。以前未见任何日本著录，而智满早死，故无从考其来源。”⁽²⁵⁾然林谦三氏又说，十七世纪初，后水尾天皇赐与京伶氏之琴谱，似即此谱⁽²⁶⁾。总之这个谱在日本长期以来，未被人注意。直到享保初年（1716—1735）有获生徂徕者，撰《徂徕幽兰琴谱》以赠京伶近宽。稍后，幸田子泉撰《幽兰字母源流》。他们见到的《幽兰》，是否就是后来神光院僧智满所藏之本，目前尚难断定。

自《古逸丛书》本问世后，中国琴家纷纷向《碣石调幽兰》问津。民国甲寅（1914年）著名琴家杨时百（宗稷）把它译成减字谱，并撰《幽兰古指法解》，载入《琴学丛书》的《琴镜》。到了五十年代，查阜西、招学庵、汪孟舒、徐元百、徐立孙、吴景略、吴振平、陈树三、龙琴舫等中国古琴家纷纷从事《幽兰》的析译订谱工作。查阜西撰《幽兰指法集解》，传播了析译《幽兰》谱的先声。中国古琴家研究《幽兰》的学术成果，都辑录在查阜西撰《幽兰研究实录》中。今天，在古琴的故乡，明月松风之夜，人们又有从泠泠七弦之上，静听到古人为隐谷之中的芗兰独茂而讴唱的赞歌了。

作为弦乐器的琴，又是何时传去日本的呢？这一问题，大致是可以肯定的。

古代传去日本之琴，是多弦的大琴，或者就是瑟，前面已有所介绍。这里需要阐述的，是指已经定了型的、具有双雁足、十三徽形制的七弦古琴。定型的七弦古琴之大量流传日本，也是在唐代。日本至今藏有多床唐制古琴，有文献资料和实物可考。

今藏东京博物院原法隆寺藏琴，铭曰：“开元十二年岁在甲子五月五日于九龙县造。”日本明和五年（1768年）实测此琴的铃木兰园，即为《东皋琴谱》作序的铃木龙，把它命名为雷琴。

另一床著名的日本藏琴，是正仓院的一张金银平文琴。此琴传入日本的年代是可考的。这张琴，可谓是一尤物。

正仓院初期的藏品，如现在《东大寺献物账》所记是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唐肃宗至德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圣武天皇七七御忌，其后献于东大寺的。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及天平宝字二年（唐肃宗乾元元年）六月一日，又同年十月一日，三次追加奉献⁽²⁷⁾。东大寺献物于明治十三年（清光绪六年）移入东京博物馆⁽²⁸⁾。

六月二十一日《献物账》开具宝物计二十二件，其中有“银平文琴”一张和“漆琴”一张。银平文琴的轸足皆象牙，琴腹有“司兵韦家造此琴”的铭文，纳于紫续袋绯续里。另一漆琴是紫檀轸，牛角足，琴腹有“峄山之岫，幽人所玩”铭文，纳紫续袋，绯续里。银平文琴后来于弘仁八年（公元817，唐宪宗元和十二年）换纳为长114.2厘米的金银平文琴。林谦三氏说，这张换纳之琴“表里两面满是金银平纹，装饰极其豪奢，世绝伦类。龙舌深设于龙唇之间，极见唐琴的规格。池内墨书‘清琴作兮□□’（高罗佩记池内琴铭为‘清琴作兮□日月，幽人间兮□□□’）。风池内有‘乙亥元年’、‘季春造作’字样。乙亥当开元廿三年，或当贞元十一年”⁽²⁹⁾。

这张金银平文琴，确为一代尤物。然林氏断为开元或贞元所斫唐琴，似有未妥。高罗佩论证此琴时，引作“乙亥之年，季春造。”⁽³⁰⁾“元年”作“之年”，“季春造”少一“作”字。究竟是“元年”，或者是“之年”，作者未见原器，未可妄断。但无论是“元年”，或“之年”，都不能轻断为开元或贞元的制品。

关于“乙亥元年”，这种仅记甲子失书年号的情况，实不多见。林氏只解释了“乙亥”二字。然“乙亥元年”四字连文，不能顾此失彼，取乙亥而舍元年。此琴制作年月，应既为乙亥，又是元年。开元廿三年、贞元十一年，虽为乙亥，然皆非元年。这两个年代，应予排除。今查公元555年，即后梁宣帝大定乙亥，其年甲子，正为乙亥。而从大定元年上溯五百年，则无既为乙亥，又是元年的历史巧合。

如果琴铭是“乙亥之年”，也不能轻断为开元或贞元。因“乙亥”之前，并无“大唐”字样。从换纳此琴，即日本弘仁八年上溯，乙亥之年，除开元、贞元而外，还有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梁大定元年（公元555年）、齐建武二年（公元495年）等等，还可以上溯数百年。然何以独取开元贞元而扬弃其余，实不可解。因此，此琴制作年月，如琴铭为“乙亥元年”，则以梁大定元年为是。如琴铭为“乙亥之年”，则不可考矣。

又考古代社会侈靡僭越之风，盛于两汉，魏晋承汉之弊，衍及南北朝，至李唐始稍戢。⁽³¹⁾西汉时大夫贾禹在东宫，看到所有的器皿玩饰，“尽文画金银饰。”

桓宽看到当时“常民文怀画像”的浮奢之风。⁽³²⁾东汉王符深深不满足于以古

“犀象珠玉，虎珀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装饰器皿的豪华现象。⁽³³⁾以金代翠，也是盛为装饰的。据《西京杂记》载：“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古代之琴，也是盛为装饰的。《西京杂记》其为伪书虽可徵，然所记中描绘之琴也很奢华的。《琴赋》中描绘之琴，在唐代就很盛行，如嵇康《琴赋》和《西京杂记》的记载是一致的。像《西京杂记》和《琴赋》所描绘如此之琴，在唐代就很盛行了。今故官博物院所藏“九霄环佩”与“大圣遗音”二唐琴，都不加任何装饰。古代把没有终也，以节制者也。刘禹锡《陋室铭》云：“可以弹素琴，阅金经。”这里提到的素琴，和丧服无关，就是通行的古琴。今正仓院所藏金银平文琴，装饰豪奢，世绝伦类，与唐代通用之琴，甚少共同之处，其非唐代所制作可知。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的五弦琴，琴身全部髹漆绘人物图案花纹。然和金银平文琴之奢华相比，尚逊一筹。

再者，乙亥若定为开元廿三年，则此宝琴存世仅82年。若定为贞元十一年，存世仅23年。琴以年代久远为贵，此古今所同。若存世不足百年，又如何能列为珍品而奉献。凡此种种，令人油然而生疑年之感。如果以梁大定元年为宝琴制作之年，则诸疑皆可冰释。

像金银平文琴这样可宝贵的实物资料的存在，充分证明古琴在古代就流传到日本的事实是无可争论的。几空空曾以日本名家大利不存其器为理由，否认古琴东传的悠久历史，自然缺少根据，不能成立。

天平胜宝八岁七月二十六日的《献物账》中，还列有银平脱梳箱一合，内盛琴弦十四条（两副）。此琴弦是中土流传，还是日本自制，已不可考。

唐以后，古琴流传日本情况，仍不断见于记载。如朱雀天皇承平四年（公元934年，后唐潞王清泰元年）及村上天皇康保四年（公元967年，宋太祖乾德五年）的《乐器目录》中，皆有藏琴的记载。又如村上天皇天历元年（公元947年，后汉高祖天福元年）宫廷内宴，有重明亲王弹奏琴曲《春莺啭》的记载。⁽³⁴⁾但自唐以兴后，古琴音乐在日本的流传趋势，日渐式微了。直到十七世纪，方才出现中兴的局面。

——莅会者——

吴鞠明
瑞
梁鹤
李农
才
长莘
元泓
丹民
田
涵
琨
瑾
欣
霜
景双
杨
孙
杜
叶
迎
勋
宏
云
杰
起
田政
橘
刘章
张索
丰

[致谢]北京窦莘元先生损赠人民币100元

· 奏者 · 刻林林函函宏宏
· 演员 · 吴陈陈杨杨刘刘姜姜
· 目录 · 月夜笙歌
· 曲名 · 山花胡三流水落雁
· 《关春大梅高洁平阳关三叠》